

一、实行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 是党的一项战略任务

多少年来 我们对干部就是包下来 能上不能下。现在看来 副作用很大。我们面前摆着这个难题 现在还没有很好的办法解决。唯一的出路是要能下。这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首先 思想上要弄通。应该说，问题倒还不全是待遇问题 解决待遇问题可以保留原薪原级 问题是职位要能下。现在副职太多，一个军区的副司令员要开两桌饭，一个省的副主席、副主任、省委副书记也要开两桌饭。这个问题 多少年来 中央在考虑 地方也在考虑 但是始终解决不了。解决这个问题 需要做很多的工作。要说服我们的干部 造成一种能下的空气。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可以不降低。要劝说一批同志去担任荣誉职务 比如在一个县 当个县的政协委员、政协副主席。省也是这样。有一部分干部可以到下面去工作 替换一些下面的干部 让他们回到生产

中去 待遇不降低。还有一部分完全不能工作的干部 索性就离开职务继续休养 或者担任一个荣誉职务。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问题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工作中的障碍，虽然一下子还不能解决，要慢慢来，但是总要逐步地解决。

《执政党的干部问题》（1962 年
11 月 29 日），《邓小平文选》第
一卷第 329 页

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 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道理很简单，任何事情都是人干的，没有大批的人才，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所以，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急需培养、选拔一大批合格的人才。这是一个新课题，也是对老同志和高级干部提出的一个责任，就是要认真选好接班人。老干部现在大体上都是六十岁左右的人了，六十岁出头的恐怕还占多数，精力毕竟不够了，不然为什么有些同志在家里办公呢？为什么不能在办公室顶八小时呢？我们在座的同志中能在办公室蹲八小时的

确实有 是不是占一半 我怀疑。我们老同志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在精力这个问题上应该有自知之明。就以我来说，精力就比过去差得多了，一天上下午安排两场活动还可以 晚上还安排就感到不行了。这是自然规律 没有办法。粉碎‘四人帮’以来 我们把老同志都陆续请回来了，并且大体上恢复了原来的或者相当于原来的职务。这样 我们的干部就多起来了。把老同志请回来是完全必要的 是非常正确的。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 是缺少一批年富力强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而没有这样一批干部 四个现代化就搞不起来。我们老同志要清醒地看到 选拔接班人这件事情不能拖。否则 搞四个现代化就会变成一句空话。我想同志们都会听到和看到这方面很多事实的。

《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20—221页

从长远着想 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老同志

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责任重大 而他们现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帮助党组织正确地选择接班人。这是一个庄严的职责。让比较年轻的同志走上第一线 老同志当好他们的参谋 支持他们的工作，这是保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的重大战略措施。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1980 年 8 月 18 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21 页

目前的问题是，现行的组织制度和为数不少的干部的思想方法，不利于选拔和使用四个现代化所急需的人才。希望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在这个问题上来个大转变 坚决解放思想 克服重重障碍 打破老框框 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 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经过十多年的考验 中青年同志的政治面貌 领导和群众基本上都是清楚的。老同志还在 采取从上看和从下看互相结合的办法 是应当可以选好选准的。这项工作 当然要有步骤

地进行 但是太慢了不行。错过时机 老同志都不在了 再来解决这个问题 就晚了 要比现在难得多 对于我们这些老同志来说 就是犯了历史性的重大错误。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6—327页

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精简这个事情可大啊 如果不搞这场革命 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 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 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 这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赞同的 包括我们自己和我們下面的干部。这确是难以为继的状态 确实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 人民不能容忍 我们党也不能容忍。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要坚持实现四个现代化,能够容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 所有老干部都要认识,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也是我们老干部的最光荣最神圣的职责;是我们对党的最后一次历史性贡献,也是对我

们每个人党性的一次严重考验。所以 这件事情必须解决 而且早就应该解决。但是 早了没有条件。现在 我们经过粉碎“四人帮”又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直到六中全会，创造了这个条件。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再晚些解决行不行呢 晚解决更困难 问题的本身会更严重 牵扯的问题也更多 牵扯的人肯定一年比一年多。还有一点 这个问题涉及很多老同志。现在确实也有个好的条件 因为许多觉悟比较高的老同志还在 能够带头 也能够克服阻力 只要大家取得一致意见 解决这个问题比较容易。所以 时间不能再拖了。总之 这是一场革命。当然 这不是对人的革命 而是对体制的革命。这场革命不搞 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 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如果不进行这场革命，不论党和政府的整个方针、政策怎样正确，工作怎样有成绩，我们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党和政府的机构这样地缺少朝气、缺少效率 正确的方针、政策不能充分贯彻 工作不能得到更大

的成绩，我们怎么能得到人民的谅解，我们自己也怎样能安心？不要只看到我们的工作确实有成绩，天天暴露的问题不晓得有多少啊！

《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1982 年 1 月 13 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96—397 页

几年来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进行得比较顺利。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各级领导岗位，都补充了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优秀干部。这次三个委员会成员的进退工作做得很好，特别是中央委员会的年轻化前进了一大步。一批老同志以实际行动，带头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推进干部制度的改革，这件事在党的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85 年 9 月 23 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45 页

这次增选的中央委员，新近上任的部长、省委书记，都比较年轻。一般是五十多岁，有的才

四十出头。我们开国时的好多部长、省委书记，也就是这个年龄。中青年干部接班 最重要的是接老同志坚持革命斗争方向的英勇精神的班。希望通过你们的努力 把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发扬起来。我曾经说过 干部不是只要年轻 有业务知识 就能解决问题 还要有好的作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深入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要敢说真话 反对说假话 不务虚名 多做实事；要公私分明 不拿原则换人情 要任人唯贤 反对任人唯亲。

我们常说 干部的新老交替 是从组织上保证我们党的政策的连续性。究竟什么是我们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呢 这里当然包括独立自主、民主法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等内外政策 这些政策我们是不会改变的。而所有这些政策的基础，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对此我们更是不会改变 不会动摇的。不然的话 我们的社会就将是一个乱的社会 就谈不上安定团结 什么建设改革、振兴中华 都将成为空话。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
的讲话》（1985 年 9 月 23 日），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46 页

我提倡废除终身制，而且提倡建立退休制度。你也知道，我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谈话时说，我干到一九八五年就行了，现在超过一年了。我正在考虑什么时候退休。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希望早退休。但这个问题比较困难 在党内和人民当中很难说服。我相信 在我有生之年退休 对现行政策能继续下去比较有利 也符合我个人向来的信念。但这件事还要做更多的说服工作。最终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决定。我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要服从人民的意愿。我还是希望能够说服人民。

《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

(1986 年 9 月 2 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74—175 页

一九八〇年我就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 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近年来 不少老同志已相继退出了中央领导岗位。一九八七年，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前，

为了身体力行地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我提出了退休的愿望。当时 中央反复考虑我本人和党内外的意见，决定同意我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 退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 决定我留任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的职务。此后 当中央的领导集体就重大问题征询我的意见时，我也始终尊重和支持中央领导集体多数同志的意见。但是 我坚持不再过问日常工作 并一直期待着尽早完成新老交替，实现从领导岗位完全退下来的愿望。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 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 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我也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去国家军委主席的请求。

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 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

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们军队所取得的成就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前进中还会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89年9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2—323页

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换了代，现在事情归新一代领导人管了。他们主持全局已经五个多月了，可以看出，中国的发展战略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并没有因为我退下来而有任何变化。我们一直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不但这一届领导人要坚持，下一届、再下一届都要坚持，一直坚持下去。为什么这些方针政策不能变呢？因为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套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放弃改革开

放，就等于放弃我们的根本发展战略。

《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1989 年 12 月 1 日),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47 页

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 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 中国就稳如泰山。国际上不可能小视我们 来中国投资的人会越来越多。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后年党代会要选一些年轻一点的精力充沛的人进政治局，进常委会更好。这一年多的成绩不可低估 国内外形势比我们预料的要好。最关紧要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这样保持五十年，六十年，社会主义中国将是不可战胜的。

《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
(1990 年 12 月 24 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65 页

二、建立健全干部离退休制度

组织路线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不是没有人才 而是被按住了。与此相关联的 在人事制度方面 可以考虑把退休制度建立起来。全国各个部门和单位设立专门机构 管理退休的、当顾问的人 负责他们的政治待遇、生活福利方面的事情。把退休人员的问题处理好 便于我们选拔人才。这需要很多的工作，但是不做不行。

《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

(1979 年 10 月 4 日),《邓小平
文选》第二卷第 197 页

前几年 我提出搞顾问制度 但并没有完全行通 许多人不愿意当顾问。现在看来 要真正解决问题不能只靠顾问制度，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这个问题 同我们每个人都有密切关系，请同志们好好地考虑一下。不建立这个制度 我们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状况 以及青

年人上不来的问题，都无法解决。有了退休制度 对各个部门、各级职务的干部的退休年龄有了明白规定，就可以使人人都知道自己到哪一年该退休。文化大革命以前 我们曾经考虑过建立干部退休制度 但当时感到不那么迫切 当时在座的同志大多是四十七八岁。一九六六年到现在十三年，在座的同志大多是六十岁左右了，这个问题迫切了 到了解决的时候了。实行退休制度是不是看不起哪个同志？不是看得起看不起哪个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兴旺发达、朝气蓬勃的一个大问题。看来 顾问制度还是一个出路 应该保留 但更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

《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1979 年 11 月 2 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26 页

体制、制度问题中 很重要的是建立军官服役、退役制度。五十年代搞了个军官服役条例，一直没有行通 后来放下了。其实那个条例基本上是个好设想、好办法。如果那个东西执行了，

就不会有现在的困难。这次会议后 就要着手研究这个问题。要有退休制度。不仅军队要有 地方也要有 国务院也要办这件事。军队干部的退休年龄要比地方干部小一些，因为军队要打仗。当然规定要切实可行。国家不建立退休制度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生气，军队不建立退休制度，也就不能保持自己的生气。有了退休制度 人人都知道自己到哪年该怎么样 这就比较好办。否则一个人一个人地处理问题 处理不下去。军队老同志退休 办法是军队把房子盖好 再转给地方。现在只能这样做 因为地方一下子接管还很难。还有 军队有些方面的工作人员可以改成文职人员、雇佣人员 不穿军服。军事院校的好多教员 也可以用文职人员 不一定用军人。教数理化的为什么一定要军人呢？该当教授就当教授 该当讲师就当讲师。军队医院也可以实行医务人员的制度 定技术职称 搞那么多行政职务干什么 这些问题都要制度化。制度化以后 编制就不会臃肿 该用一个人就是一个人 该用几个人就是几个人。总之，这一套制度要建立起来，要好好地找些人来专门研究。

《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1980年3月12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87—288页

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也有关系。革命战争时期大家年纪都还轻，五十年代正值年富力强，不存在退休问题，但是后来没有及时解决，是一个失策。应当承认，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这个问题也无法解决或无法完全解决。五中全会讨论的党章草案，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在看来，还需要进一步修改、补充。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1—332页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中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